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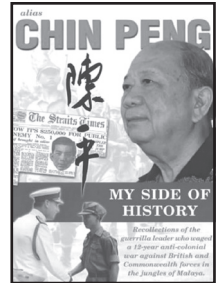
Book Review

走上不同斗争道路，错过建国历史契机：

评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口述历史

张锦忠（台湾高雄国立中山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Chin Peng, as told to Ian Ward and Norma Mirafior, **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由沃特夫妇（Ian Ward and Norma Mirafior）代笔的前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英文回忆录《别名陈平：我这一面的历史》（*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是近年来继李光耀两卷回忆录之后的“东南亚学”重要文献，为欲了解东南亚政治历史与离散华人族裔漂泊史的研究者必读之书。尽管陈平及两位捉刀人都同意，这不是一本书写马来西亚共产党历史的叙事，而是选择不同建国途径者的一段心路历程，读者仍然难免对此有所期待，陈平也的确揭露了若干党内党外内情，自有助于厘清历史的某一面貌。

陈平深知历史书写充满疑义（*problematic*）。历史书写的总已是胜利者或掌权者的那一边的历史。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自古已然。在马来（西）亚的建国历史中，马来西亚共产党属失败者，处于权力的边陲，因此在诸家马来（西）亚史书写中，马共所占的篇幅不多。在紧急状态时期他们当然是要角，但却难免被再现成“歹角”——对抗政府的黠武共产恐怖分子，甚至不是战争中的对手（英国人不愿正视紧急状态时期的战事为战争）。世人多半忘了，尽管马共最后走上武装斗争的路线，他们和各族建国先贤一样，也曾怀着梦想，要在没有殖民者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各族平权的国家。不过，当陈平指出图书馆与档案处所见的历史文献终究是从胜利者的角度呈现的历史话语时，似乎也承认了他和他的马共同志的斗争失败。

历史果然充满吊诡与辩证。马来（西）亚独立了，抗日反殖的马共却变成了恐怖分子，陈平成为头号通缉犯，各族表面上平等但其实并不平权。不过，

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未尝不是好事：建国先贤留下的未竟之业，让这一代的青年还有理想可以继续燃烧，而不只是坐在前人栽种的树下乘凉，同时了解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坚持理想与热情是要付出代价的。

陈平和他的马共同志在丛林中坚持理想数十载，他们是走过马来（西）亚建国史的见证者，其证言保存了人民记忆。1955年华玲会谈时陈平、陈田、拉昔·迈丁都年华正茂，陈平尤其青春年少，到了1989年合艾和谈时，他们都已垂垂老矣，近乎一辈子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他们躲过了日军、英军与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追捕与围剿、从丛林中的斗争与疾病存活，却躲不过无情岁月的摧残，最后已不谈理想，只求尊严。如果说胜利者的历史记载的是光荣战绩与丰功伟业，失败者与权力边缘者这一边的历史记录的是夕阳余晖般的尊严。诚然，不管成功或失败，坚持理想与热情者应有其尊严。

《别名陈平：我这一面的历史》从1943年底马共与联军抗日部队在美罗附近的柏兰丹（Blantan）马共军营签署合作协定讲起。日据不久，陈平奉命和一三六部队的英国军官戴维思（John Davis）及布润（Richard Broome）接触，双方建立关系，最后达成联军与马共携手合作抗日的共识，遂有1943年12月31日的“美罗协定”。当年协议书的签署人为马共代表张红、戴维思、布润与通译陈春林，另外两个在场而没签名的人是英国游击战略专家查普曼（F. Spencer Chapman）与抗日军代表陈金声。在几乎一甲子的时间之后，陈平回想起来，这张协约书其实已埋下了战后马共对殖民政府武装斗争的种子；双方同床异梦，互不信任，彼此心里有数：合作只是权宜之计，英国人绝不会放弃新马这块物产丰富的土地，太平洋战事终战之日必然也是双方决裂之时。事实上，六人之中，三个代表不同立场的亚洲人并没显示真实身分。张红其实是马共当时的总书记莱特、陈春林即国民党人林谋盛化名、陈金声就是陈平。而英国人早就知道张红就是莱特，戴维思之前已经在新加坡见过他（陈平倒不认为莱特知道陈春林即林谋盛）。远在三十年代莱特即被殖民政府收买为间谍。众人不知道的是，这位马共总书记同时也是日本皇军的间谍。今天我们还不太清楚，日军究竟有没有从莱特那儿获悉双方在丛林协议合作，如果有，何以不采取行动？

本书从英国人与马共抗日军的1943年12月31日协议切入，可谓饶富意义，因为这张协议预示了这本回忆录的主要内容：马共与英军从敌人变成抗日盟友、

战后英人卷土重来，彼此间的互不信任浮上台面、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迫使马共继续武装反殖斗争，失去分享独立建国成果的历史契机，最后只能北撤退守泰南，历史就这样成为胜利者的见证。另一方面，见证这一纸协议书的两个马共党人莱特与陈平的角色与命运在战后各有起落：莱特为三重间谍的面目被揭穿后，马共总书记卷款亡命天涯，陈平则由地方委员升任总书记，成为马共的领导人。

马共的马来亚革命斗争或可简化为战前时期、日据时期、和平时期、紧急状态时期、与独立后时期。过去各家的相关论述多聚焦于紧急状态时期，其中以西方学者的著作居多（例如 John Coates, Donald Mackay, Edgar O' Balance, Anthony Short, Brian Stewart），近年来则颇有一些学者积极探讨日据时期马共抗日活动（例如 Ban Kah Choon）。在早期的“马共研究”相关著作中，Cheah Boon Kheng的《红星照耀马来亚》(Red Star Over Malaya) 当然已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作，不过查普曼1950年出版的热带雨林回忆录《丛林中间地带》(The Jungle is Neutral) 可能提供读者更多一手数据。事隔多年，近八十岁的陈平在回想丛林武装斗争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时，有些细节已不复记忆，还得翻阅查普曼的书查证。同样的，比起许多“马共研究”论述，陈平的回忆录可观，也因为它是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换句话说，关于马共的发展与斗争及其历史功过，研究新马历史与政治的学者与一般读者并非毫无认识，当年马共及左翼政治与社会运动自有其辉煌时光，支持者不在少数。这几年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陈凯、单汝洪的回忆录陆续出版，也提供了不少历史见证者的声音。读者对陈平这本口述回忆录感兴趣的地方，正在于他自己怎么看待这段历史，他如何“以口代笔”，书写这段他以及他的马共同志没有能够改写的历史。

尽管执笔者沃特夫妇感兴趣的是探讨紧急状态历史里的人性以及敌对双方如何以宣传手法牺牲真相，陈平在这部口述历史里最终还是试图还原他所认知与经历的“历史真相”：指出英国殖民政府及独立后执政的联盟与国阵政府如何丑化马共党人为“共产恐怖分子”（而陈平则是“恐怖分子首脑”），并交代马共（对抗日、除殖与独立）的历史功过。

马共在1930年成立（在此之前，只有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与1927年改组的南洋共产党；南共解散，马共成立时，在场的共产国际代表为越南人

阮爱国，即胡志明），十年后十六岁的陈平入党（后来逃亡时才宣誓成为正式党员）。在此之前，陈平只是一位霹雳实兆远的左倾华校中学生，读过《苏联共产党史》、史诺的《西行漫记》、安娜·史特荣的《苏维埃民主》等中译本及毛泽东的小册子《论持久战》，觉得这些书所传播的思想比三民主义受用，毛着尤其令他心折。他加入马共主导的抗敌后援会之后成为学生会活跃分子，遂为马共所吸收。不久抗敌后援会成员同学纷纷被捕，陈平眼看大祸即将临头，毅然潜逃他乡（瓜拉江沙、太平、怡保、和丰、珠宝……），从此开始了他作为马共地下活动分子的流亡生涯。这时原名王文华的陈平化名王平，同志则称他阿平（后来莱特要提供马共军委名字给英国人时，忘了阿平原姓王而替他取名「陈平」）。这样的心路历程，其实也是许多四十年代左派知识青年男女的共同经验。

抗日以前马共并没有武装部队，但在鼓吹抗日卫马、介入工会、吸收学生方面展现了一定的力量，难免招来殖民政府的镇压。日军南下，新马沦陷，马共号召青年加入人民抗日军走入丛林打游击战，选派党员赴新加坡接受英军军事训练。但是这时的马共究竟是个怎样的组织，恐怕连陈平自己也不甚了了，这段历史还需要更多史家补述。后来黄石（黄诚 / 詹元豹，来马时已是中共党员）被捕致死，马共成为莱特一人党部。陈平书中所描述的马共领导人莱特，讲华语发音奇特，写中文夹杂越南文，阅读中文能力颇有问题，但相当能言善道，常吹嘘自己的共产国际关系。陈平初识莱特时，对他颇有好感，深庆马共有这样的领导人。不过，党中央的元老领导人居然被殖民主义者（英人）与帝国主义者（日人）收买，不惜出卖同志求荣，以致马共元气大伤，这当然不是甚么光彩的历史。莱特之外，书中还描述了其它马共党人被捕而出卖同志的例子，连日后马共分裂成不同派系也跟同志告发事件脱离不了干系。

陈平（或方壮璧）这一辈的马共党人在晚年解除武装，以笔代枪，念兹在兹的正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过去英殖民政府与独立后新马内政部或军方皆视马共为匪寇，以“共产恐怖分子”称之，尤其令曾经抗日卫马的马共党人难以接受。客观说来，马共当年不只抗日卫马有功（英国政府并未否认这一点，陈平还是获颁帝国勋章的军官“OBE”呢），对新马独立建国也的确有其贡献。虽然他们没有果断地在战后英军重返南洋之前把握历史契机，马上号召

各族人民展开抗英除殖革命独立运动，以致渐渐失去历史舞台，他们的武装斗争也逼使英国承认剿共并未如预期容易，因此结束战争的最好方式就是尽早还政于新马人民。以后见之明看来，如果英国当年不让步同意新马自治独立，而继续以军事镇压，新马极可能有如法美二国的印度支那与越南战场，成为英国的历史负担。

尽管马共当时拥有抗英反殖的实力与能力，却失去制敌先机在前，解除武装之后又未能成为合法政党联合其它左翼党派或独立参选，北撤后的斗争决策也不无受中共左右之嫌，以致不只一次错过历史契机与转机，其斗争事业终归失败也就不能归咎于历史的意外了。以华玲会谈为例，不管会谈在马共党史或新马历史上多么重要，马共当时实为东姑阿都拉曼跟英国人谈判的筹码（或者说，让东姑阿都拉曼在伦敦跟英国人谈判时握有筹码）。这一点相信陈平等代表也深知，但是后来马共仍对自伦敦返马的东姑有所期待，未免就过于乐观了。陈平对这位后来成为马来（西）亚国父的巫统新领袖显然颇有好感，认为他相当诚恳，虽然他知道东姑也有复杂的一面。从他的自叙看来，陈平自己行事低调，作风温和平实，以致另一位谈判对手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在和谈之后认为陈平没有马共领导人的威严。

本书叙事写人，以平易文字夹叙夹议，诚如书名所示，呈现了不少显露历史另一面的小故事（例如英国人刻意安排陈平的旧识戴维思在华玲会谈时接应马共代表，其实另有密谋），但也仅限于这些小故事，至于世人深感兴趣的马共组织及派系内斗、丛林游击队员生活细节、马共和其地下及外围组织关系等内幕，作者并未多加叙述，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是陈平所提供的他这一面的历史，本书也不见得就是全貌，史家还得继续拼凑。英文版的《别名陈平：我这一面的历史》于2003年出版，中译本迄今未见上市，倒是陈松沾与卡尔·贺克编辑的《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C. C. Chin and Karl Hack, eds., *Dialogues with Chin Peng: New Light on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于2004年推出，两书可谓陈平口述历史姊妹篇，读者可以找来并读。随着陈平、方壮璧、陈凯、单汝洪等马共党人的自叙与回忆录陆续出版，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学者有了更多一手文献可以参考，相信一本《马共七十年》之类的历史著作指日可待。